

青年农民从事农业的市场与组织困境及其突围

——基于西部L镇31个青年农民的个案研究

梁 栋

【摘要】文章以西部L镇31个青年农民的访谈个案为基础,根据有无流动经历,可将留居乡村的青年农民分为被动留居者和返乡青年农民,虽然他们共居于乡野,但留居的行动逻辑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如此,留在乡村、从事农业的青年农民面临共同的市场风险和组织化困境。为了摆脱困境,作为能动主体的青年农民敏锐地根据变迁着的乡村社会环境及新的城乡关系,从自我的社会流动记忆中汲取资源和知识,并争取家庭、圈子的支持,以农业为基础,走上嵌入式创新创业之路。青年农民的突围既增加了收入,又有利于解决留守和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且在更高的层次上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关系构建。

【关键词】青年农民;农业;组织化;市场困境;突围;城乡一体化

【作者简介】梁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中国青年研究》(京),2018.3.97~105

【基金项目】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合作项目“青年农民:青年人从事农业的路径研究”(201704811210212)。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以候鸟式的流动模式往返于城乡之间,体量巨大的农民工群体社会流动推动着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转型。进入新时代,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的返乡运动成为推动社会转型以及改变城乡关系的新的方面,具有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意义^[1]。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加快推进以及伴随农业供给侧改革而来的多种政策向农村、农业领域倾斜,农民返乡运动呈现出由经济、社会危机刺激下的被动返乡模式向主动返乡模式转变,返乡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成为农村世界里“创业的一代”。他们勇敢地创新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利用多种途径践行着中央所提倡的产业融合,并事实上成为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农村青年将成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

必将成为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实现产业融合的未来主体。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考察青年农民返乡事农过程中所面临的市场困境和组织化缺失及突破路径就具有了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提出

自十八大以来,中央格外强调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农业逐渐市场化的背景下,既有研究对农民从事农业的组织化形式、所面临的市场困境及解决对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总体上来看,关于农民所面临的市场、组织化困境及突围,已有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一般化的意义上对农民从事农业所面临的市场化和

组织化困境进行研究,二是对返乡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创业行为进行研究。

关于第一个方面,如有学者提出农业和农民只有与市场紧密结合,农业产业才有条件得到提升,农民才有可能实现最大的物质利益^[23]。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也提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与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并提出产业化经营需要实现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生产大户等的组织化生产形态^[4]。但也有学者如叶敬忠指出,当农民的双脚站在市场之中,一分耕耘却未必能有一分收获,市场机制看似给农民提供了过上丰裕生活的机会,实际上却无处不在地瓦解着农民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农民的劳动与收获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弱化^[5]。同时,作为农民组织化重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在实践中也容易遭遇“异化”的组织困境,会成为下乡资本与少数乡村精英包装资本、谋利经营的策略和工具^[6]。大市场风险的存在,也使生产大户等规模化经营主体不断发生跑路事件,下乡的资本遭遇失败和破产困境屡见不鲜。在地方实践中,依靠诸如专业合作社等的组织化生产经营似乎在现实层面遭遇较大瓶颈,当生产形式停留在单一的作物种植、农村产业局限于单一的第一产业时,情形尤为如此。曹锦清认为面对市场困境,农民组织化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但难以组织起来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行动逻辑^[7]。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植根于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行动原则^[8]和农民的兼业化^[9]是难以实现农民组织化的根源。

关于第二个方面,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国家“双创”对农村青年的政策支持,返乡的农村青年创业活动正在逐渐升温,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青年就是革命的生力军,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10]。夏柱智对嵌入于乡土社会中的返乡青年创业所做的研究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快了城乡一体化^[11]。刘同山、毛飞及孔祥智对青年农民精英所做的研究表明,青年农民精英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形塑力量,在调整农村产业结

构、带动农民组织化致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2]。此外,也有学者对青年农民返乡创业所遭遇的现实困境进行了研究,如徐勇指出特定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社会环境会造成青年农民的发展困境,如青年农民的无地化,并警惕要防止无地青年农民“游民化”^[13]。徐勇所谓的无地青年农民是指居住于城市边缘或被征地区域的特殊青年群体,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普通青年农民并无指涉。何绍辉对“生而无地”的青年农民群体的类型、成因等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在户籍制度、地权调整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14]。有学者也对青年农民创业的灰化现象进行了研究^{[15][16]},从侧面表明当代农村青年留在农村获得发展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困境。还有学者通过案例研究认为当前的青年农民工离城返乡并非逆城市化,而是城市化或市民化失败的另一个表现^[17]。

透过上述观点和研究视角可有以下几点发现。虽然第一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但缺少青年视角,且大多在宏观的乡村治理、市场机制及农村社会结构维度上展开研究,缺乏微观的个案叙事。第二个方面虽然注入了青年视角,但遗憾的是,多数是以青年农民中的精英群体或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如刘同山的精英青年农民、徐勇的无地农民研究以及邓万春对青年农民的“灰化”研究。关于青年农民返乡创业,既有研究也并未集中关注返乡创业的农业基础,而更倾向于非农业。因此,在克服上述观点及视角不足的基础上,本文将以西部的农村L镇的31个青年农民案例的深描为基础,在更为一般化的意义上考察当前青年农民从事农业的路径特征,既关注留居乡野的普通青年农民,也注意考察正在突破市场及无组织双重困境的精英青年农民。此外,在加入分层与流动视角的基础上,可在完整的谱系上呈现出青年农民事农路径的动态跃迁过程及其与城乡一体化之间的互构关联。

二、田野素描与研究对象概况

L镇位于川北山区,海拔在1000米以上,距离县

城50公里,距离市区70公里。L镇是典型的西部山区农业型乡镇,农业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高山寒凉气候及山区土地细碎化决定了当地农民普遍选择种植蔬菜,品种主要是甘蓝、海椒等。L镇也附带地存在特色产业如天麻、山葵、五味子等中药材种植业,但体量很小。L镇的蔬菜种植始自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农民在粮食产量不高的土地上尝试小范围的蔬菜生产。由于气候优势,当地的蔬菜品质高,农民拿到山下去也能看得见市场。“粮菜”种植逐渐成为农民稳定的生计模式。后续经过当地政府的推广,到2008年前后,L镇已经形成了鲜明的蔬菜种植产业化。蔬菜种植基本覆盖了全镇所有农户,蔬菜种植面积大幅增加,蔬菜产业成为该镇主要的农业经济支柱。尽管如此,L镇不似平原,这里人均土地面积少,仅靠土地仍不足以谋生,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有大量的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45岁以下的青年劳动力极少,留守老人则继续从事粮菜种植,投身于蔬菜的产业化。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务工市场的不景气,陆续地有农民开始返乡,尤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的返乡潮为甚。当前,L镇正响应国家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号召,继续围绕蔬菜产业做文章。此外,自2012年开始,当地开始推行“农旅结合”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推广以家户为经营形式的农家乐。政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农民的返乡意愿和进程。回乡后,青年农民仍然以土地为基础从事市场化的蔬菜生产,面临着较大的市场和组织化困境;同时也有部分青年农民融合多种产业元素,尝试突破传统经营模式。

在L镇的3个村莊,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在县政协、L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帮助下选取了31位45岁以下的青年农民进行深度访谈,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在31位被访谈对象中,年龄最小者仅19岁,最大者45岁,留在或返回农村的青年农民主体的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上。研究对象总体上的文化资本偏弱,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9位,数量最多;其次是初中文化程度的有11位;高中文化程度的仅有1位。性别比例上,17位被访者为男性,14位为女性。31位研究对象中的24位都曾有外出务工经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近两年返乡;只有7位从未有过外出务工经历,但其中的6位是女性。若将女性青年农民在家庭性别分工中的特殊性考虑在内,31位研究对象的社会流动特征可谓非常明显。在青年农民从事的职业划分上,有21位仍然继续从事市场化的蔬菜种植业,有1位担任某村的村主任,2位从事中药材的种植业,有6位返乡青年农民从事“农旅结合”的农家乐,有1位是放养60匹马、30余只羊的规模养殖户。

在L镇,青年农民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他们在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趋势格外明显,绝大多数留居乡野的青年农民都有过外出务工经历;二是他们在农业基础上所从事的具体职业也有所分化。青年农民的这两个特征与当地特定的自然禀赋有关,也与产业化、商品化的蔬菜种植业有关,同时与当前的农村产业政策也关系密切。

三、为何留下,又何以返乡

在L镇及广大的西部农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兴起了一股民工潮,农民工持续地、大规模地流动在城乡之间。农民社会流动是我们思考任何三农问题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背景,因此若要从一个完整的谱系上把握青年农民在农村生活及农业生产中的现时状态,需要区分未曾有过社会流动的青年农民和外出务工后又返乡的青年农民,尽管他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年龄			文化程度			是否有务工经历		性别		目前从事的行业				
≤30	31~40	>40	小学	初中	高中	是	否	男	女	蔬菜种植	农家乐	村干部	种药材	规模养殖
5	10	16	19	11	1	24	7	17	14	21	6	1	2	1

们现时地共存于村庄,但留在或返回乡野的逻辑既有关联又存在较大不同。

1. 为何留下

目前,农村普遍呈现出的一个现实是,在人均土地稀缺且呈现出细碎化状态下,单纯地在土地上从事农业尤其是传统的粮食种植并不能真正地获得体面生活。在农村生活全面商品化及货币化的当代,农民依靠土地谋生的压力日增。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年轻人首要的目标就是挣到钱。在L镇,45岁以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很少,乡干部皆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农业没有吸引力”,他们解释为两个具体的原因:一是青年人难以获得自我价值的实践感;二是从事农业难以获得物质、经济上的满足。留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多是由于没有充足体力在城市里谋取职业,或是由于家里有老人、孩子及病人需要照顾而对劳动力外出所造成的束缚。此外,对于青年女性来说,父权制背景下的村庄及家庭文化规约也使她们不得外出。因此,对于那些从未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青年农民来说,大多是一种被动留居。在我们访谈的31位青年农民中,有7位属于从未外出过的情况,5位属于被动留居(表2)。

YL村的WS 42岁,从来没有出去打过工。他所在的生产队,除他之外45岁以下的年轻人全都出去打工了。WS之所以没有外出,是因为90年代末打工形势刚兴起时,家里有两个年迈的老人需要照顾,走不掉。老人去世后,孩子又慢慢地长大了,一来二去也就错过了最好的打工时期。加上前几年当地的蔬菜产业发展得很好,WS在家种着4亩蔬菜也能有点收入,同时利用空闲时间去本地的一个景区公园做小工。现在蔬菜市场也不好了,想出去也没人要了。

对于农村男性青年农民来说,他们外出务工主要依靠的是充足的劳动力资本,20~45岁往往成为青年农民在外务工的“黄金年龄”,像WS这样年轻时由于照顾老人孩子而无法走掉的,年龄大了再外出时就面临着劳动供给不足的缺陷。在L镇,青年农民早期留守务农可以说是一种主动选择,因为那时的蔬菜价格相对稳定,外出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也较低,种菜的收入与外出打工的收入相差不大。而随着蔬菜产业大规模地铺开,菜价波动较大,农民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而此时再想外出却面临年龄偏大的问题。

而对于女性青年农民来说,她们经常由于家庭再生产的特殊性别分工模式、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家庭理性主义以及来自村庄与家庭的文化规束而被动留居^[8]。在西部较为落后的山区农村,情形尤为如此。

YL村的GJ 40岁,她说从小家里和村里就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父母把读书的机会留给了男孩,GJ小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家里帮着种地了。她说,自己二三十岁正年轻时,村里和家里都不鼓励女孩子出去打工。年轻女孩的本分就是在家照顾好父母、安心帮着家里种菜。GJ婚后生了2个儿子,目前一个19岁,一个12岁,这几年由于照顾孩子也没走掉。

随着L镇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青年女性也加入外出打工的潮流中,年轻女性不被允许外出的禁忌被逐渐打破,但像GJ所面临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尴尬处境仍然是一个巨大限制。

2. 缘何返乡

对于那些外出后又返乡的青年农民,他们退守乡野的逻辑和那些完全被动留居者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照顾老人、孩子为表征的家庭再生产的需要是

表2 从未外出务工的青年农民数量及性别

从未外出务工的原因	频数	性别
照顾老人、孩子	3	1男2女
村庄、家庭不允许女孩外出	2	女
本地做生意	1	女
在家自由	1	女

他们最终共处于农村的共同原因;区别在于,青年农民的返乡动力表现为打工生活的推力和回乡创业的拉力。在我们访谈的24位返乡青年农民中,有10人的返乡原因是照顾老人及孩子,有4人是“受够了”漂泊在外的打工生活,有6人是受乡村发展环境及回乡创业政策的吸引而主动还乡(见表3)。我们对后两个逻辑进行简要分析。

(1)打工生活的意义弱化及尊严缺失

辗转于城市、流动于不同非农职业间的青年农民,看似在自由地以劳动力换取收入,实则不然。具有主体意识的当代青年农民在体验到打工生活的无意义感和缺少尊严后,无奈返乡,于城市而言,他们不过是匆匆过客。

MZ村的LM初中毕业以后就外出打工了,来到湖北的一家工厂。他说,自己并不习惯于城市中的生活,过于紧张的快节奏让他感受到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虽然在城市里工作能多带来些收入,但是像机器人一样的工作节奏让这个仅有26岁的年轻人直呼“太压抑了”。LM越来越觉得城市中的打工生活没意思、没意义;在家种蔬菜,价格好了还是能赚到钱,通过在地上的自由劳动获得收入,就会让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2017年上半年回乡后,他继续在自家12亩的承包地上从事蔬菜种植,也会尝试小范围的生态种植。

YL村的WY是被访谈对象中唯一有高中学历的青年农民,高中毕业后先后辗转于成都、北京等大城市打工。在南京时,有一天下雨无法开工,工友们都在走廊里睡午觉。老板“突然袭击”时看到了这个场景,跟着这位老板做了六年的一个员工也趁机休息,老板看到后当场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从此以后,WY就一直觉得在

外打工特别没有安全感,既没有尊严又没有保障,没过多久也回到了L镇。

(2)创业驱动的返乡

近年来,随着农村交通条件改善,人们的出行半径逐渐扩大,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逐渐松动。L镇夏季的高山寒凉气候吸引了不少周边城市居民前来避暑度假,自2013年起,L镇的“农旅结合”发展得有声有色。在政府的推广和政策吸引下,也由于看到了创业先行者实际获得的利润,不少在外打工的青年农民开始返乡创业。

QL村的YJ44岁,婚后就去了北京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在特别高的脚手架上往下看,是灯红酒绿的北京城,但这不属于我”,工作的高风险、低工资让YJ逐渐地有了回家的念头。2008年开始,县里开始重点发展蔬菜产业,他果断地回来种菜。2013年起,上山来的城里人多了,他开始翻修自家的木结构房屋,收拾出8个房间给客人住宿。新农村建设帮助他粉刷了墙壁,清理了道路。YJ表示,再也不会外出打工了。

无论是家庭再生产的软需求,还是城市打工生活的推力及回乡创业的拉力,青年农民的返乡动力结构并无清晰的界限。“家里有老人和孩子,回来还能继续种菜”“在外面打工也攒了点钱,回家开个农家乐,老婆孩子热炕头”,家本位的农村社会性质决定了青年农民返乡动力中的复合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农民的返乡路径越来越呈现为经济、社会危机刺激下的被动返乡模式向主动返乡模式转变的趋势。

四、青年农民从事农业的市场困境和组织化缺失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L镇外出务工的大量农

表3 返乡青年农民的原因

返乡原因	数量
照顾老人孩子	10
打工辛苦、工资少、没尊严	4
回乡创业	6

民工纷纷返乡,其中不乏一些青年农民。此时恰逢县里推行蔬菜种植产业化,政府鼓励农民种蔬菜,农民将粮地改为菜地后,首年可在正常的农业补贴之外再额外领取每亩地100元的种菜补贴。L镇的蔬菜产业持续发展,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到2014年前后基本覆盖了全部的农户。同时,县农业局与L镇政府一道规划规模化的蔬菜园区并采取企业经营形式,政府还以项目的形式成立了一家“曙光”合作社。2008-2014年期间,农民种植高产的甘蓝、海椒等蔬菜能获得不少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加之农业税刚取消不久,国家以各种农业补贴的形式向农民反哺。在外部务工市场急速收缩的情况下,L镇的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吸引青年农民返乡的动力之一——被访谈的31位青年农民中有21位主要从事蔬菜种植业,经营农家乐的6位青年农民也主要依赖家庭生产的蔬菜作为食材来源。2014年以后,随着高山蔬菜产业在类似L镇的西部山区全面推广开来,已固化且有限的市场无法容纳蔬菜的大规模集中上市,已选择留在农村的青年农民日益感到深陷市场困境之中,同时面临组织化缺失的问题。

1. 青年农民从事农业的市场困境

(1) 市场的结构性风险:“碰”“赌”“撞”

青年农民从事高度商品化和市场化农业的结构性风险表现为面对看不见的泛市场与大市场,农民普遍感觉到劳动与收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脆弱,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劳动投入和收获不成正比”。对此,农民也有自己形象的表达,如“种菜像碰运气”“种菜就像赌博一样”“撞上了就赚,撞不上就赔”。在31位被访谈青年农民中,有28位表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困难是市场价格的不稳定。市场风险的结构性在于,农民已无法通过提高产量或减少成本增加收益,农民的自主行动和能动性受到市场结构的框构。农民已不能通过控制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资料投入来获取相应的收入,能获得多少收入甚至能否获得收入都开始取决于他时、他地、他人的生产情形。然而,由于在西部欠发达的乡村没有足够的非农生计渠道,为了应对水涨船高的日常消费,农民在种地

面前普遍没有更好选择。面对市场的结构性风险,青年农民往往感到一股强烈的无力感,不利于他们继续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信心建立。

MZ村42岁的PH种着10亩海椒和莲花白,往年种的人不像现在这么多,那时候还是能赚钱的。从去年开始,菜价开始掉得厉害,听说四川凉山和甘肃定西等好多地方都开始大规模地种高山蔬菜了,“只有等他们那里受灾了我们这里的菜才能卖上好价钱”。“种地太辛苦了,要是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就赔钱,行情好点的时候也就是保本,赚钱也是赚个劳务费。种地没意思。”PH大哥、二哥、二姐的地都荒了,长成了林子。“往年种地时,种的粮食,只求温饱,也不跟市场打交道,那时候种下去5斤粮食,收上来15斤就算赚了,现在不一样了,种下去的跟收上来的不成比例。”

MZ村的YX种了20亩包菜,其中10亩是外出打工的邻居“送”给他种的,不收租金,邻居回来还给他即可。“种菜就是碰,碰到了就赚钱,碰不到就赔钱,种菜就是这样。前年包菜的价格是8分钱,十几亩地产了10万斤菜吧,我一斤都没卖,全烂在了地里。雇人摘菜的工钱都赚不回来。有人收,但只有几分钱一斤,越卖赔得越多。家里有孩子上学,需要花钱的地方多,碰上也好,碰不上也好,这地还是得种。”

(2) 有风险无规避:农民被市场“边缘化”

高度产业化的蔬菜生产必然卷入市场,市场的结构性风险也是必然;但在生产与销售环节若无市场服务或风险化解的机制则必然将风险实体化并深嵌于青年农民的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中。在L镇,青年农民被市场边缘化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农业保险的形同虚设。地方政府与保险公司合谋,权力介入农民购买保险的决策过程中,L镇几乎家家户户都购买了农业保险。但当蔬菜遭遇价格滑铁卢时,在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的保险公司却拒绝为农民赔付。

YL村40岁的ZJ在家种了7亩莲花白,虽然给7亩蔬菜上了保险,但去年包菜卖得都亏本

了,却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虽然追要过两次,但是都被保险公司的人推托了,之后赔偿的事也就不了了之。ZJ说:“入保险时政府答应得挺好,说白了我们买保险也是卖政府领导一个面子,如果不买就感觉是得罪了政府一样。”

(3)通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谈判地位弱势

尽管近年来L镇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条件取得很大改善,但仍然有一些村庄偏居一隅,公路不通制约了农民与菜贩的谈判地位。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劣势在农民通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中设置了障碍,农民每逢卖菜时只能被动地接受外来菜贩子提供的低价格,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充斥市场的外来小菜贩也形成一个个分散的市场权力中心,他们控制着最终的蔬菜价格。

QL村31岁的LH在家种了近9亩菜,每年卖菜时都是令他倍感头疼的时候。村里的一队、三队和五队,道路都没有硬化,仍然全部是泥巴路。“一下雨全是泥,车子都开不上去。就拿五队来说,地很好,就是路不好,菜是靠小菜贩子开农用车倒出去卖的,菜贩子在这里收2毛,一出去就卖5毛,农民就白白损失了3毛的利润。”

在上述市场困境存在的情形下,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或许是对抗市场风险的一条可行路径。

2. 青年农民从事农业的组织化缺失

(1)合作组织化困境

为了应对普遍出现的市场风险,通过合作社寻求农民组织化成为一个惯用做法,合作社通常被认为可在组织农民生产、销售环节降低成本并增强农民的市场谈判地位。但从L镇的实践来看,“曙光”合作社并未起到预期的组织化服务功能,农民的组织化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首先,在农民生产环节,合作社成为压榨农民、在农民身上赚取利润的市场主体和赢利工具,受益的是少数乡村精英^[6];讽刺的是,政府对此类农业组织的支持却乐此不疲。农民组织化在实践中成为政策支持大户、从小农抽身而退的主要渠道。

MZ村的青年农民PH就说,“曙光”合作社

对社员没有什么标准,什么人都可以加入,只要种菜、一年交100块钱(往年是50块),在合作社里买种子、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时就有优惠。PH说,这实际上就是花钱买了张“会员卡”,合作社极有可能把生产资料的价格无形之中提高了再卖给农民,“买得多优惠得多,这不就是变相促销嘛!”

因此,在生产环节,以合作社为载体的组织化并未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其次,在销售环节,组织化服务也并未到位,乡村精英化身经纪人,然而并未提供经纪代理服务。遭遇蔬菜市场行情恶化时,合作社也无能为力。“卖不出去就是卖不出去。”“今年上半年的莴笋,只有1毛钱,合作社收时也是听外来收菜老板的报价,它也无能为力,它为收菜老板代收从中赚取不菲的代收费,没能力也不想掺和讨价还价。”作为组织化手段和载体的合作社在农民生产与销售环节均日益悬浮于农民利益之上,为自我利益服务的动机占据先导地位。组织合作化机制的缺失也给挤压农民市场利益的“二道贩子”留下了更大获利空间。

(2)服务组织化困境

青年农民从事农业的服务组织化表现为农技和金融服务的组织缺失。由于L镇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种蔬菜,且常年无轮作地大规模扩大种植范围,对良种、化肥和农药的农业资本化路径依赖日益强化,结果便是土壤中由于积累大量细菌而发生病变现象,只要种植十字花科的蔬菜品种,就会出现“菠萝病”。目前,L镇1/3的可耕地出现了“菠萝病”。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获得防治病害的农技服务和相关技术培训至关重要。在农业技术服务市场化的背景下,返乡务农的青年农民普遍表示越来越难以获得农技服务。依托政府资源整合的农技服务更加倾向于生产大户、农业企业,而从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小农抽身而退。市场化之后,传统的以乡镇、村庄集体为农技服务自我组织基础的农技服务提供机制也开始瓦解,作为分散的农民个体,其所掌握的本土农技知识无法适配由先进的进口种子、纷繁复杂

的化肥和农药所堆积起来的“大农业”，农民的农技服务提供面临组织化困境。

MZ村PH说：“现在做事(种地)的得不到政策支持，不做事的反而受到额外保护，比方说现在很多企业来流转土地的，政府给他们补这补那，普通的老百姓只能干看着。”“政府花700多万元给合作社搞了个大型冷库，最多可容纳100多吨菜，行情不好的时候它(合作社)就可以低价收上三四车存放在冷库里，价格高了再卖出去。老百姓能得到什么？”

QL村青年农民LH去年种了300多棵核桃苗，死了一百多棵。“没人给你培训，现在都不知道去找谁给咱培训，(核桃树)叶子上有卷叶病，自己买药打，打死了一百多棵。”

MZ村19岁的ZX返乡后想在农业上干一番事业，打起了种五味子的主意。种五味子最需要技术，但像育苗等关键技术没法获得。年轻的ZX只能求之于网上搜索，“百度是最常用的，靠网上也失败过，花了3000多块钱买了假种子”。ZX边失败边自己摸索经验，他想带领村民发展五味子产业园，但是这和村委会和镇上的规划发生冲突。镇上支持村里成立合作社，9个村干部是股东，村委会干涉其他农户不要掺和ZX的事，镇上也认为不种菜去搞别的是错误的。

随着农民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分化和职业分流日益明显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由集体化向悬浮化转变，农民越来越成为利益联结分散、发展追求互相独立的原子化个体——在农业公共服务抽离于农民时，农民的个体化也成为阻碍农民自我组织起来的重要因素。然而，越是如此，农民也越对政府有所期待，面对农民个体化在应对市场风险中的强烈无力感，多数被访谈对象都表达过“单打独斗不行”的想法以及“政府要把农民组织起来”的需求。

五、青年农民的突围

面对市场的结构性风险及难以实现组织化的现

实困境，多数青年农民很难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打破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也不容易突破既有固化的农村社会分层结构。但作为能动的主体，返乡的青年农民也会利用从丰富非农流动经历中获得的各种资本进行创新性农业生产，尝试在困境中突围并取得了成功。

1. 产业融合的基础和条件

L镇的产业融合主要是将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以发展农家乐为组织载体。产业融合的基础和条件有两个，一是L镇的自然禀赋优势，二是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对“农旅结合”的重视并营造条件。独特的高山气候条件和自然景观使L镇所在的曾家山成为中国十大避暑名山之一，每年的6-9月份都会陆续吸引城里人前来消暑度假。L镇为了调动起农民投身农家乐的热情，政府一方面通过门户微信订阅号将L镇的旅游资源推广出去以吸引更多的游客，一方面打造农家乐的样板制造示范效应。L镇的农家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由2012年的1家发展到2017年上半年的102家。在访谈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还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农民在观望，极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创业对象。

2. 农业经营形式突围

农业经营形式的突围集中表现为青年农民改以往的“粮菜”种植模式为“粮菜+服务业”模式。结婚不久的青年农民大多将较新的房屋改造装修成整洁、舒适的客房，接待上山避暑的城里人住宿。此外，农家乐经营者采取“住宿+餐饮”的经营模式，蔬菜、粮食及肉蛋等食物“就地取材”——来自农民的庭院经济。往往在市场上一文不值的蔬菜，当以“农家菜”的形式提供给客人时，却能使农民获得不错的收益。第一产业的农业中加入了新的产业元素，也将作为传统农业生产者的农民变为了新的产业经营者。除了经营农家乐，随着农村社会环境和城乡关系的变化，也有青年农民抓住契机从事多种形式的创业活动。但无论创业形式如何，青年农民对经营形式的改变都是以农业为基础，因此也可称之为农业经营形式的突围。YL村26岁的ZJ，他的创业活动

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ZJ高中只念了7天就出去打工了,先后去过本市和青岛做学徒,学习修车和厨师,也和哥哥在临沂开过快餐店。返乡后,以合同工的形式进入市里一家电信公司成为业务员,后来和哥哥注册了一家个体户,承揽电信公司的相关业务外包。多年在外打拼,ZJ对“赚钱”情有独钟,也善于抓住机会。最近两三年,通信业务遭遇瓶颈,但随着“多彩曾家山”品牌打出去,ZJ想做番文章。他果断返乡,投资40多万加盖、装修房屋,可接待50余人住宿。父母还种着5亩地,养了100多只鸡、2头猪。在成立“白云农庄”前,ZJ曾因为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家乡菜而被朋友关注,他在2016年春节前夕将村里的12头猪以20元每斤的单价快递到全国各地的好友手中。成功体验过“互联网+农业”后,ZJ的“白云农庄”就这样成立了。目前,ZJ每天都在接待上山的游客。一人住一天、吃三顿农家饭收费80~100元。

3. 嵌入式创业:青年农民突围的机制

农民草根青年的创业行动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嵌入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青年农民在农村的创业活动中格外依赖自然禀赋、家庭物质资本,这也是农村创业的鲜明特征。如L镇,创业前所属农村地区的气候、地形、环境等都直接决定了创业的方向和进程。此外,家庭物质资本如房屋、土地等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与城市创业对货币资本的过度单一依赖不尽相同,青年农民的草创行动深深地嵌入乡土社会。其次,青年农民创业行动对家庭支持和家庭农业的依赖明显。若没有父母从事庭院种养殖及免费提供房屋,ZJ的创业行动便无从说起。就地取材的食材、几乎拿来即用的房屋以及不计报酬的家庭劳动力支持都是青年农民取得突破的重要支撑。最后,青年农民的创业行动深嵌在“熟人”和“朋友圈”之中,对关系资本较为依赖。仍以ZJ为例,在早期外出务工历程中,青年农民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像ZJ一样的青年农民在创业的终端拥有了一个熟悉而非陌生的“市场”,ZJ销售土猪的客户大

都是在外打工时认识的朋友和本市的客户,来乡下避暑度假的客人也多是朋友推荐。

在嵌入之外,城乡关系二元结构的松动、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政策的支持,以及青年农民自身的创业勇气和精神,都成为草根青年农民突围的重要动力。

4. 青年农民突围的经济与社会效应

微观上,带来的首要变化就是青年农民收入的增加,进而带动其他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青年农民的返乡也使农村更加有活力,有利于解决留守人口难题和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YL村是L镇较大的村,村里最先开始经营农家乐的是“姚家大院”,2015年时村里还不超过10家,今年突然增加了20多家,经营者几乎都是年轻人。该村书记认为新的产业经营形式正在吸引一批年轻人回乡,他认为上年纪的农民在理念和方法上都跟不上这个产业的需要。加上在当地政府严格的食品与居住安全标准下,年轻人更适合做这个新行业。

38岁的YQ家里有2亩地,单纯在家种菜根本无法解决家庭生计。她和丈夫已经在外打工3年了,12岁的小儿子在镇上上学,成为留守儿童。随着外面打工行情的急转直下,也由于看到上山来的城里人越来越多,她和丈夫前不久刚返乡。他们已经在工商局注册了农家乐营业执照,正在装修房屋。夫妻返乡避免了小儿子继续成为留守儿童。

其次,青年农民的农产品直接面向城市的消费者,他们开始迎合城市人对农产品健康品质的需求,有意识地摆脱或减弱对化肥、农药的依赖而采用生态种养殖的方式,以扭转传统“化学农业”的弊端,土壤革命正在悄悄发生。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之路,在青年农民的行动中慢慢铺就。

最后,青年农民通过创新创业实现突围,激活了社会流动,有利于打破已固化了的(农村)社会分层体制,在宏观上也有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关系建构。在青年农民“外出-返乡”双向运动及城市人越来越多地进入、关注农村的现实背景和趋势下,农村

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再抽象地停留在二元对立的层面,开始在人的交往与沟通理性下建构并加速着一体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和青年农民的突围,本身是一对互构关系,未来的乡村振兴亦有赖于此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六、简要的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西部一个产业化蔬菜生产镇31位青年农民的深度访谈,发现被动的青年农民留居者和返乡青年农民在留居乡野的逻辑上存在明显不同,二者在引起研究者及政策的关注时应当做类型学划分。但当他们现时地共居于乡村、共生于农业之上时,却共性地面临市场的结构性风险和难以组织化的困境,这置青年农民的生计与发展于不利境地,固化着既定的农民分层,维系着底层社会的结构。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以及农村社会自身环境的改变,青年农民尤其是返乡青年农民也开始能动地利用环境优势和自身创业资源,在农业基础上创新生产与经营形式,实现着对结构性市场风险和无组织困境的突破。青年农民的草创行动具有鲜明的嵌入性,这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且熟悉的市場,对创业初期的青年农民将风险最小化是一个优势;另一方面,“朋友圈”的狭小似乎不利于扩大再生产,但后者在目前的实践中尚未明显出现,总体上返乡青年农民的生计伦理超过致富伦理。青年农民的突围也产生了鲜明的经济与社会效应,为解决目前较为棘手的三农问题提供了思路,也为城乡一体化的关系构建扫清了障碍。

参考文献:

[1][11]夏柱智.嵌入乡村社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对H镇38例返乡创业者的深描[J].中国青年研究,2017(06):5-11.

[2]高勇.大力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对成都市农村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农村经济,2003(11):1-4.

[3]赵泉民.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农民组织化的基点[J].理论学刊,2005(07):76-79.

[4]张红宇.对新时期农民组织化几个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7(03):4-10.

[5]叶敬忠.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当农民双脚站在市场经济之中[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5-13.

[6]冯小.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以“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4(02):2-8.

[7]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764-765.

[8]蒋永甫,黄林海.差序格局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本土化路径[J].学习论坛,2014(05):44-49.

[9]张兆曙.产品依赖性与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难题——一种农民日常生活的新视角[J].人文杂志,2009(02):167-171.

[10]曾静.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及其当代价值[J].青年研究,2016(04):1-8.

[12]刘同山,毛飞,孔祥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青年农民精英的作用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农村经济,2015(09):104-109.

[13]徐勇.防止无地青年“农民”游民化[J].探索与争鸣,2008(03):8-10.

[14]何绍辉.“无地青年农民”:内涵、特征及其走向[J].中国青年研究,2010(02):30-34.

[15]邓万春.“聚在一起发财”——新农村建设中的青年农民的“灰化”参与[J].中国青年研究,2011(09):29-33.

[16]徐晓军,孙奥.论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乡村“灰恶化”风险[J].人文杂志,2009(03):188-192.

[17]刘友富,李向平.“逆城市化”还是“伪城市化”?——反思大学生、农民“离城返乡”问题兼与沈东商榷[J].中国青年研究,2017(06):24-30.

[18]梁栋,吴惠芳.农业女性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对农村性别关系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四川及山西三省的村庄实地调研[J].妇女研究论丛,2017(06).